



明代内库与

财政体制变迁研究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NEIKU AND
FINANCIAL SYSTEM OF MING DYNASTY

李园
著

厘清
国家库藏的
设置与收支形态是
认识
明代财权分配体制
和财政转型的
重要视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明代内库与

财政体制变迁研究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NEIKU AND
FINANCIAL SYSTEM OF MING DYNASTY

李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 / 李园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7

ISBN 978 - 7 - 5201 - 4434 - 6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财政改革 - 财政史 - 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F81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756 号

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

著 者 / 李 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建廷

文稿编辑 / 张金木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1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434 - 6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云南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7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ZS025）研究成果

序

——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

传统社会的财政，是一种“理财之政”，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形成以国家为主体的收入与分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公”“私”两套管理系统。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已经有明确的划分，形成较为严密的内廷和外朝的制度分野，内库的收入与储藏，越来越具有皇室私藏的性质，户部的收入与储备，越来越具有国家财政的性质。松井义夫在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注意到清朝户部与内务府的关系：“作为皇室的经费，一般有皇室财产收入、例贡和各省解输的内务府经费三项，但又不拘泥于此，内务府经常向户部‘借拨’银两以充经费，然而这种所谓的‘借拨’，又往往成为永久的借入。”^①同时，内库的私藏也有拨充国家财政的事例。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或内库与部库的交叉混同。这实际上是帝制时代在“家国一体”的制度环境下，两套管理系统之间存在财政上的不可避免的交织关系。公为私用或私为公用，几成为传统社会财政运作的两种常态。因此，对于传统社会财政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方面或一个视角。

我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对皇室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明代以何本方、高寿仙、赵中男、苏新红等人为代表，近年又有李园的相关研究。清代以台湾学者赖慧敏的研究最为突出，我恰好评阅了她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2014）的送审稿，其送审稿的名称就是《乾隆朝的皇室财政》，该书对乾隆一朝涉及皇室财政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大陆学者祁美琴、汪茂和、成嘉玲、魏鉴勋、关嘉

^① [日] 松井义夫：《清朝经费的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1935），第17～18页。

录、滕德永、申学锋、陈锋等人也有相关论文，但未见系统全面的专著。”^①其意旨在说明学界对皇室财政研究的薄弱。

明代是我国传统财政的重要变革时期，这种“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以明代中后期的货币白银化为契机，国家财政的运作形态经历了一场以实物为主体到以白银货币为主体的财政转型，这一转型的直观体现就是皇室库藏和国家库藏收支形态（实物——白银）的变化，而在收支统计口径上的变化，则是由粮食为统计标准转变为以银两为统计标准，笔者称之为“统计银两化”。^②其次，内库作为宫廷御用库藏和皇室财政的体现，在明代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特别是明初的内库，虽然有皇室收支的职能，但更多地体现着国家财政的职能，或者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高度混同。在户部太仓银库和南京户部银库设立后，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才趋向明晰化。明代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及其变动，要远比清代复杂。最后，从学理上讲，皇室财政以内库为载体，国家财政以户部为载体，除了明初内库明显的承担过户部的职能外，在其他时期，除了户部外，兵部、工部在相当程度上也承担了国家财政的职能，兵部太常寺常盈库和工部节慎库独立于户部的财政体系之外。这种状况，也远比清代复杂。因此，研究明代财政，在许多方面具有挑战意义和广阔的研究空间。该书选取明代内库为研究对象，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此前较为“神秘”的明代内廷财务的运作机制，也为我们认识明代财政的体制设计及其变迁路径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选取内库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说属于皇室财政的研究范畴，作者在对内库的规制、内库的监管体制、内库的收支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对内库与基层上供负担以及内库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进行了个案考察和宏观探讨，可以说是独辟蹊径。通过对明代内库收贮结构及其形态变迁的考察，探讨了明代中央财政体制从单一到多元，从高度集权到相对分权，从明初实物体制到后期白银货币体制的转型路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内库与部寺财政之间围绕财权、财力、事权、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学界注意。

而该书提出的一些新见，如通过考察洪武时期内库钱、银、钞等货币

^① 陈锋：《近40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

^② 陈锋：《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

支取情况，对明初“实物型财政体制”的重新评估；通过考察内库物料折银对内廷既得利益的损害，分析晚明“财政白银化”的局限原因；通过对万历“矿税”之征的后期变动考察，重新估算了万历“矿税”的上解内库数额；通过对明末内库支帑和金花银逋欠情况的数据考察，反驳了自清代以来出现的明亡内库“厚积”之说；通过选取松江府的地域个案考察，探讨了明代基层赋役变革与上供构成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账簿以外的地方实际上供承担问题。凡此见解，也值得学界注意。

该书是作者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本专著，相信该书出版后，会促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陈锋

2019年5月8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绪 论 / 1

- 一 问题与思路 / 1
- 二 相关研究回顾 / 6
- 三 研究对象的界定 / 33
- 四 方法与史料 / 35

第一章 明代内库规制考述 / 37

- 一 明代以前的内库沿革 / 37
- 二 明代内库的建置沿革与布局 / 44
- 三 明代内库的人员构成与职责 / 60

第二章 明代内库的监管体制及问题 / 83

- 一 司礼监与内库监管 / 83
- 二 内库监管的外廷介入与局限 / 88
- 三 内库监管问题及影响 / 101

第三章 明代内库的收支结构与前期特征 / 124

- 一 明初实物型财政与“京库”概念 / 124
- 二 内库收入常项 / 126
- 三 内库支取常项 / 176
- 四 明初内库体制的再认识 / 192

第四章 明代中后期的内库变革与局限 / 199

- 一 明中后期内库财源的动摇与财政困窘 / 199
- 二 明中后期内库收入的折变与量变 / 205
- 三 明中后期内库支取的白银化与局限 / 224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内库与国家财政 / 232

- 一 明中后期中央外库的置建与内库财政的权责分流 / 232
- 二 明中后期内库职能的“内化”与地位 / 251
- 三 万历外库危机与矿税之征 / 255
- 四 辽东之变后的内库支取与存储变动 / 266
- 五 内库正额的流失：金花银的后期逋欠与实征 / 277
- 六 明亡内库存银辨析 / 280

第六章 明代内库与基层上供负担——基于松江府的区域考察 / 283

- 一 区域选择 / 283
- 二 周忱轻赋改革与上供调整 / 285
- 三 “耗羨归公”与京徭之困 / 289
- 四 松江府织造负担 / 296
- 五 “条鞭”核算下的松江上供负担 / 300

结 语 / 305

参考文献 / 310

后 记 / 333

绪论

一 问题与思路

自秦汉以迄明清的中国传统财政长期存在或隐或显的二元财政格局，即在以计司为代表的国家公财政之外，还存在为满足宫廷、政治等多重需要，由君主（或内廷）直接掌控的帝室财政，后者的直接体现是以内库为核心的财政运作体制的长期存在。内库作为天子别藏，一方面，与计司外库之间存在财赋分配上的博弈关系，因此内库的规模与调整势必关涉国家财政的运作；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的制度环境下，内库作为君主集权的财政杠杆，其职能上的亦公亦私往往超出御用范畴，成为国家财政的一端。^①因此，研究内库制度，既可以了解传统财政的公私体制与动向，亦可以透过该视角，理解王朝贡赋体制下不同利益划分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财政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变革时期。与以西方发展经验为理论的明代唱衰论和“停滞论”不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穆先生

^① 对于汉代以来内库的公共职能，学界已有关注，具体可参见〔日〕加藤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之一斑》，收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03~104页；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第151~157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071~1076页；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25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第601页；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李伟国《论宋代内库的地位与作用》，收入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42页；赵轶峰《明代宫廷典制的特色》，收入《故宫学与明代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1~12页；苏新红《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朱云飞《中国古代皇室财政制度的沿革：轨迹、规律与启示——基于权力异化与公权私有的视角》，《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关注了明代体制的进步一面，并将该阶段视为现代中国的开端^①，这种转变在财政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众所周知，自唐宋变革以来，传统国家财政经历了一场由实物主导型向货币主导型的转变历程，该转变完成时间就在明代。对此，梁方仲先生曾将16世纪“一条鞭法”的田赋银纳化视作对两三千年来实物田赋制度的打破和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②万明则以白银化为视角，将16世纪出现的明代财政从实物向货币的全面转型视为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③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这场财政转型较以往时期更为剧烈，正如明清财政史学者所指出的，明初所构建的是一种反市场的，以实物和徭役为特色的洪武型财政体制，其货币成分几乎消失，是对唐宋变革以来货币化财政制度的一种否定。^④针对明初体制的逆转问题，学术界又先后提出了明初“断裂说”“倒退论”“北制优势说”“独立历史单元”等观点。^⑤故明代的财政变革是一场唐宋变革成果局部逆转背景下的传统实物体制向现代货币体制的跨越性变革。作为这场巨变的重要内容，国家库藏结构及其形态的变迁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内库作为传统财政的存储、调度机构，具有浓厚的宫廷与集权色彩。学界以往研究揭示，明初成立的内库在性质上亦公亦私，是以负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皇室收支为辅的机构。^⑥从明代京师库藏的置建序列来看，经历了先内库后外库，由单一到多元的逐步变迁过程。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4页。（按序该书写于1955年）

② 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

③ 万明：《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第A05版。

④ 参见刘光临《嘉靖朝抗倭战争和一条鞭法的展开》，《明清论丛》第12辑，故宫出版社，2012。

⑤ 不同观点可分别参见 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in Smith P.,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35-70. 转引自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350~351页；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⑥ 参见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251页；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内库收支的特点及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内库（洪武二年置，1369）——户部太仓银库（正统七年置，1442）——兵部太常寺常盈库（成化四年置，1468）——南京户部银库（弘治八年置，1495）——工部节慎库（嘉靖八年置，1529）——南京节慎库（嘉靖十二年置，1533）

以正统七年京师太仓银库的置建为界，明代京师的库藏体系截然两分。前期内库作为京师仓储以外的单一库藏系统长期存在，故对于明初财政体制的中时段考察，内库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明代中后期虽然国家财政体系出现重构，但内库在国家财政运作中仍居于重要地位。天启元年（1621）户部专理新饷郎中杨嗣昌在《恭承召问疏》中指出：“盖在官者，莫多于内库，则议减者，莫先于内库。”^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亦云：“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② 根据迄今存留的我国古代唯一一部国家财政总册《万历会计录》记载，晚明内府的常项收入约占中央财政的五分之二。^③ 故就明代内库的长期财政地位而言，如果缺乏对内库财政问题的考察，就不足以厘清明代财政的全貌。

内库层面的明代宫廷财政 21世纪以来随着“故宫学”的构建与兴起，明清宫廷财政研究日益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较之系统保存的清宫内府档案文献，明代宫廷财政史料因年代久远和明清易代等，存在零散、缺漏等诸多问题。加之明代公私财政在支出环节长期混淆不清，因此从短期研究而言，难以达到对明代宫廷财政的完整把握。因此，作为前期的探索性考察，宫廷库藏无疑是一个重要切入点。一方面，内库作为宫廷财物的主要存储、调度机构，其收支盈缩直接折射出宫廷财政的规模与变动；另一方面，现存明代官方政书和时人奏疏保存了大量内库进纳和库储数据，其原因是明代宫廷除皇庄、皇店以外，始终未能确立独立的财源，户、工等外廷承担了内库主要财物的派征、划拨之责，刘利平将该模式称为“财源合一”型。^④ 因

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之《恭承召问疏》，梁颂成校点，岳麓书社，2008，第249页。

②（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奄宦一》，段志强译注，中华书局，2011，第172页。

③《万历会计录》卷1，《旧额现额岁入岁出总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22页。（根据笔者后文的探讨，该数额比重仅为各类钱粮物资的单位简单叠加，并不代表内库物料的实际折银价值）

④参见刘利平《明代户部与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第89页。

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以内库为视角审视明代宫廷财政具有可行性。

内库视角下的明代财政转型 财政转型意味着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替，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国家财政运作形态白银化的展开，置建于明初实物财政体制下的内库运作形态出现局部调整。20世纪70年代，全汉昇、李龙华在梳理明代中后期太仓银库收入时的一则结论值得注意，指出：明中后期太仓银库岁入，除明末加派之外，主要源自既有税目的折银。^①换言之，户部财政的形成途径主要是以折银方式对原有财源的重新分割，而非突破旧有赋税格局的额外加征。近年来聚焦于太仓库、节慎库的研究发现，明代中后期户、工等外部财政的形成与发展，与内库的实物以及钱钞折银存在一定关联。^②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明代内库在财政转型中的定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将内库视为明代财政白银化程度的较高领域，如万明、徐英凯在对《万历会计录》的数据梳理后得出：万历初年内府供用的货币化比例已达78.51%，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其程度仅次于边镇粮饷，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平均货币化比例（49.41%）。^③另一种是将内府置于国家财政转型的对立面，黄仁宇、赵中男先后从内府实物折银对宫廷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害，分析了后期内库物料的改折困境问题。^④事实上，二者并非矛盾，前者体现了明代财政货币化转型的总体趋势，后者则揭示了传统政治环境下财政转型的局限问题。故从长时段的新旧财政体制的交替来看，内库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财政转型的路径、步骤以及特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视角。

内库与明代社会经济 财政社会学将财政问题视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熊彼特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财政史是最为基本的。为了满

① 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第237~268页。

② 参见苏新红《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4。

③ 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7页。

④ [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35页；赵中男：《明代物料征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第81~82页。

足国家需要对经济进行的抽取及其使用的结果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历史时期，由财政需要和国家政策产生的对经济发展、所有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所有方面直接影响实际上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一切主要特征。对大多数历史时期，他都提供了这样的强大的解释力……”^①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史学的繁兴，学术界对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倾向于展现一种“官民互视”“活”的历史，在考察制度内部结构与变迁的同时，更加关注制度与社会、制度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内库作为明代基层赋税的征解末端，其收贮规模、结构、形态以及入库体制的调整，与基层赋役、社会、经济的变迁存在部分关联。近年来，对白粮、官布、上供物料等内库财物的专题研究揭示，内府财物在入库环节的勒索行为是导致基层徭役之困的重要因素之一。^② 吴滔、佐藤仁史在对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变迁考察中，注意到贡赋系统下明代内库改折官布与江南“专业市镇”的形成关系。^③ 诸如此类，无不揭示了明代内库运作机制与社会、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本书对明代内库的研究，力图突破“就库论库”的研究局限，尝试对内库制度影响下的部分基层赋役问题做分析探讨。

基于上述思考与研究理路，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通过对明代内库建置沿革、监管体制和常态化收支结构等规制问题的梳理，考察内库运作机制和前期实物体制下的职能与地位问题；二是以明代中后期内库的结构、形态变迁为视角，考察明代财政转型的路径、步骤以及特征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转型背景下的明代财政体制的重构，以及官府财政机构围绕其中财权、财力、事权、责任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三是通过对基层上供负担以及部分社会问题的地域考察，探讨明代内府财政体制对基层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

① 转自 R. A. Musgrave《熊彼特的〈税务国家的危机〉：一篇财政社会学论文》，杨少文译，刘志广校，<http://max.book118.com/html/2015/0415/1497710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15日。

② 关于内库白粮、官布、上供物料等财物的进纳负担问题，后文研究述评将分别涉及，此不赘列。

③ 吴滔、〔日〕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76~77页。

二 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时代，内库作为宫廷内部的基本财物存储机构，在研究视角上多被置于宫廷财政的范畴进行探讨，基于此，笔者以“明代宫廷财政史”为视角梳理学术脉络，进而搭建课题研究的基点。

（一）研究概况

迄今为止，虽然未见以“明代宫廷财政史”为题的系统性专著出版，但围绕该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综观近百年的研究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20世纪20~40年代

确切来说，近代意义上的明代宫廷财政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①，作为国内早期受西方经济理论影响写成的通史性财政论著，该书第六章“元明之财政”对明代宫廷财政所涉及的内府十库、金花银、珠宝采购、万历矿税以及内府侵夺户部等问题，进行了分条论述。1926年徐式圭的《中国财政史略》^②“明之财政”一章，又对金花银、皇庄、贡献等宫廷收入进行了简述。

30~40年代，伴随一批通史性专题论著的相继出版，明代宫廷财政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③分析了洪武时期的君主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钱穆的《国史大纲》^④关注了明代中期以来的宫廷用度膨胀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朱伯康、祝慈寿的《中国经济史纲要》^⑤对明代皇庄问题略有论述。马大英等人合编的《田赋会要》第三编“田赋史·明代”^⑥，零散论述了明代皇庄、土贡、民运白粮以及金花银、宫庄籽粒、丝绵等御用钱物情况。第四节“明代征物种类及处理”，探讨了明代解

① 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② 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③ 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④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该书最早于1940年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⑤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⑥ 参见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等《田赋会要·第三编·田赋史》（下），正中书局，1944。

京金银宝物的分配问题，并对金花银、宫庄籽粒、丝绵等御用钱物做了分类罗列。第六节“额外征派”，重点就明代解纳内库的土贡、军需物料的性质、征派以及演变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明代土贡的性质，著者认为随着宫廷用度的渐奢，所谓土贡经历了由贡到税的转变。

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① 作为一部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力作，该书第三章“全国经济大搜刮”，对内库管理、矿监税使、宫廷采造（织造、烧造）、皇庄管理等情况进行了略述。钱健夫的《明代亡国的经济因素》^② 一文论述了内帑与明亡的关系，认为朝臣竭力奏取和浪费内帑财富，是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国内外还涌现出一些围绕皇庄、金花银、造办、朝贡等问题的专题论作。

总体上看，该阶段研究虽然较为零散，部分论述也重“述”轻“论”。但就呈现内容而言，已涉及明代宫廷财政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2. 相关论题的深化与拓展：20 世纪 50 ~ 90 年代

20 世纪后半叶，虽然明代宫廷财政研究的零散性未能得到根本改观，且其间因受国内政治运动影响出现研究断层，但从整体来看，该时期部分传统议题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综合性探讨较为突出，研究视域有所拓展。

国内研究方面，围绕以金花银、皇庄、土贡等为代表的传统议题探讨得到进一步深化。一方面，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围绕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涉及了明代宫廷财政部分议题。如侯外庐、李埏关于皇庄性质的判定^③，陈诗启、彭泽益围绕服务于宫廷的明代官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探讨。^④ 90 年代，唐文基^⑤对作为基层赋役内容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该书完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② 钱健夫：《明代亡国的经济因素》，《启示》1949 年新 2。

③ 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一文中，将皇庄归于皇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发展的第二阶段（安史之乱至清初），并认为“在后一期庄田形式的官庄、皇庄、官田、皇田等直接领有之下，地租的形态虽有改变，特别是明末的货币地租‘见亩征银’，但土地所有制的古老形式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李埏在《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 年第 8 期）一文中将皇庄归于大土地占有制，并认为大土地占有制与土地国有制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

④ 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陈诗启：《明代的官手工业及其演变》，《历史教学》1962 年第 10 期；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

⑤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的上供物料、金花银等论题有深入考察。另一方面，首次出现以“宫中财政”为题的研究专文。何本方的《明代宫中财政述略》^①作为国内第一篇以“宫中财政”为题的专论，无疑是该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文章对明代宫廷财政的收支内容进行了梳理。何本方将明代宫中财政与户部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两个特征：其一体现在财源方面，明宫财政与国家财政，主要是户部财政，有分有合，前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又很难与后者完全分开；其二体现在财政管理方面，实行预算与决算。宫中之财源是立足于户部财赋，同时又保有皇室的私收入。

60~90年代，一批财政通史性专著对明代皇室支出、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如周伯棣在《中国财政史》^②第八章“明代的财政”中对明代宫廷库藏系统和宫廷消费情况略有论述，指出：国家财政支出以最大地主的皇室费用为中心，其他必要的支出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皇室的利益。台湾学者陈秀夔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史》两部著作，对于明代皇室财政的见解较为独到。在《中国财政制度史》^③第二编“帝国时代财政制度”中将明代皇室财政置于帝国（秦汉以迄明清）时期财政的组成部分进行概括，指出：帝国时代财政与封建时代（夏商周）财政不同之一，在于君主经费与国家经费的分开管理与使用。但对于陈秀夔所指的：在帝国时代的一级财政制度下，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均集权于政府，君主经费亦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君主不能干涉国家财政的系列论断，值得进一步商榷。《中国财政史》则以明代财务行政中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分析了国家经费与皇室经费的划分。

国外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④是一部以“明代财政”为题的研究专著，该书特点正如1973年英国汉学家崔瑞德在序中对黄著的评价那样：“力图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关于宫廷财政，该书虽未以专门章节论述，但对宫廷财政的部分问题有较为独到的思考。譬如在宫廷消费与国家

① 何本方：《明代宫中财政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② 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③ 陈秀夔：《中国财政制度史》，正中书局，1973，第90~92、147页；陈秀夔：《中国财政史》（增订本），正中书局，1983，第211~212、280页。

④ [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凤等译。（该书英文版于1974年出版）